

下篇 思想史訪談錄

思想的背景

118

著作的分析

138

思想史的外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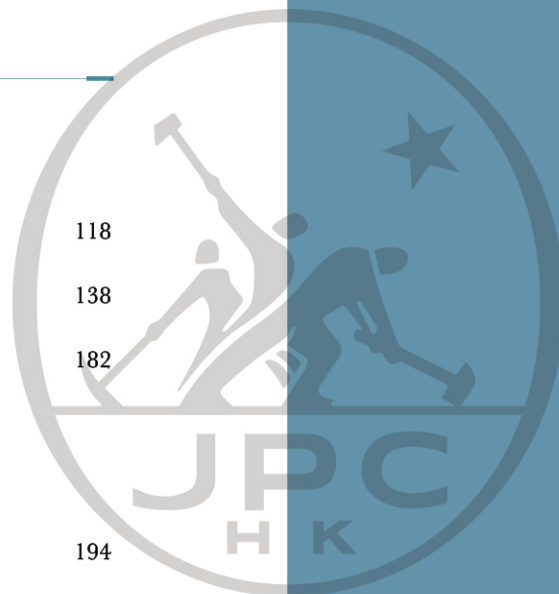
182

訪談後記

194

編後記

196



上篇

跨學科的思想史

## 近代西方史學的新趨勢

### 一、史學危機

首先我要強調的是，我在這裏談的主要是我個人的學術經歷，所以其中帶有個人觀察的局限性。近幾十年，從史學發展來講，二十世紀最後一、二十年傳統史學面臨重大的挑戰，其最大的挑戰是來自「後現代」。有人甚至認為這是從希羅多德（Herodotus，約前 484 年-前 425 年）、司馬遷（前 145 年-前 86 年）以來史學所面臨最嚴重的挑戰。

十九世紀末有歷史主義（historicism），企圖把一切放在歷史發展的情境下加以歷史化，也就沒有所謂永恒不變的真理，因此導致西方道德、宗教、倫理等基礎的動搖，但那次史學危機還不能和二十世紀末的史學危機相比。

二十世紀末的史學危機在我看來可謂來勢洶洶。我在 1985 年進入中研院，1987 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唸書。從 1987 至 1992 年，我尚未強烈感受到「後現代」對傳統史學的批判。普林斯頓大學當時在歷史方面可謂大師雲集，不可能對外面的變化毫無所知，但當時的我卻未深刻感覺到後現代來勢洶洶，可見其時「後現代」還未能動搖幾個老派的學校，這些學者還相

信歷史有存在的根基。<sup>1</sup>但是整體看來，在二十世紀最後的一、二十年，傳統史學面臨很大的挑戰。

### 二、對傳統史學的挑戰

1824 年，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寫了《1494 至 1514 年間羅馬民族與日爾曼民族的歷史》（*History of the Latin and Teutonic Nations from 1494 to 1514*），該書後的附錄影響最大。他說在經過種種批判之後，連當時被認為最權威的著作都不可以被率然接受，這帶來根本性的改變。首先是強調第一手史料的重要性；同時是對外交史研究的重視，蘭克曾往來於歐洲各地發掘檔案，特別是教廷。在歐洲史上，教廷地位十分重要，各國大使頻繁進出，蘭克接觸到教廷各種檔案，開啟了錯綜複雜的外交史研究。他的口號「寫歷史一如它所發生的」，對當時史學界有很深的影響。大概從 1840 年以後，德國史學界已經籠罩在蘭克的影響之下。

蘭克的口才非常差，無法吸引學生聽課，但他首創 seminar 的教學方式，使得歷史教學不再只是講述（lecture），而是一起討論、研判史料，帶來無遠弗屆的影響。1870 年以後，蘭克治學的特色，如講究原始史料、重視檔案、嚴格史料批判、職業史學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等風格散佈至世界各地。亞洲國

1 他們體現的史學風格與傳統史家不同，比較受人類學者紀爾茲（Clifford Geertz, 1926–2006）的影響，傾向帶有人類學意味的歷史題目。

家如日本有蘭克學生到東京大學教書，影響日本史學界甚巨；美國早期許多傑出史家也多到德國取經，直接或間接受蘭克學派影響。蘭克學生所辦的雜誌是許多國家史學雜誌的典範，包括中研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回顧過去的史學史，最大的問題是太多從里程碑式史學宣言來看歷史風格的變化。里程碑式文獻誠然重要，但歷史風格變化應從實際操作中顯現出來，過去史學史的毛病是太過重視思想性的、史學方法指導性的、里程碑式的或宣言式的文字，忽略了之後在某種氣氛之下史學著作所反映出來的風格。

其實早期蘭克學派的學生很少人真正讀過《蘭克全集》，大多只是就各人興趣專長，讀個一鱗半爪，產生關鍵影響的反倒是伯倫漢（Ernst Bernheim, 1850–1942）。他把蘭克史學和實證主義哲學（positivism）混合，其《史學方法論》（*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n*）一書影響很大，許多人透過伯倫漢的書而接受蘭克史學，如史語所創所人傅斯年（1896–1950）被認為創辦了「中國的蘭克學派」。但實際上他一生只提到過蘭克兩次，他的藏書中也沒有蘭克的書籍，但是我注意到他把伯倫漢《史學方法論》的書皮都讀破了。

但到了二十世紀，蘭克的史學風格卻遭到挑戰，伊格爾斯（Georg Iggers, 1926–2017）在1997年出版的《二十世紀西方史學》（*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一書中談到二十世紀傳統史學典範的動搖，此書稍嫌簡略，但可提供一個輪廓。書中談到蘭克學派動搖的原因之一，是人們不再滿足於政治外交史，或以重要人物及歷史事件為主的敘述方式。人們認為歷史應紮根於更廣

泛、非個人的經濟社會基礎的了解。德國社會歷史學派、美國社會科學影響下的歷史與法國年鑑學派，基本上均代表對過去史學風格的修正，他們要求歷史的客觀與嚴謹和蘭克是相同的，但是認為歷史應有社會面貌，歷史的理解應莫基於社會經濟的基礎上。

接著是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是後現代理論對史學客觀性的挑戰，後現代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文本」。「作品」是在人的意圖之下所寫出來的，後現代認為沒有作品，全部都是文本，與作者意圖無關，是語言的力量，語言可以顛覆人的意圖，人其實是在語言的牢房裏面。後現代一個重要的理論來源，是上世紀末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在《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書中所提出的語言學觀念，認為語言可以分成「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在各種語言中能指與所指沒有固定一對一的關係，而是任意性的關係，他認為語言所講的與所指的東西是無法復原的，文本的語言後面所指的（signified）無法復原，既然都是讀文本，則我們的了解都是一樣的。語言和其所指的東西是任意性關係，百年之後讀此文獻，大家解釋都是一樣，因為後面指涉的東西無法復原，都是某種程度的物事，所有人都是同樣地對同一東西的再現。既然你的是再現（representation），我的也是再現，那我們之間有甚麼高下之分？所謂歷史真相到底又在哪裏？

薩伊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也產生相當影響，書中講西方早期對東方（指中亞或西亞）的了解都帶上白種人的眼光，無法說他們再現的

「東方」是真實的，他們的再現只是各種再現中的一種，則何者客觀？歷史的真到底在哪裏？

英國業餘史家詹京斯（Keith Jenkins）所寫的《歷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這本小冊子，把「過去」和「歷史」截然二分，「過去」無法由「歷史」完整呈現，而且每一個人在呈現過去時都有許多主觀見解夾雜其中，有各種偏見和各種考慮。所以歷史的客觀性（objectivity）是甚麼？這個影響一開始只是水壩的一個小洞，只是「能指」和「所指」沒有固定對應關係，變成「文本」，到後來「文本」後面的東西無法復原，到最後是歷史的客觀性是無法追求的。

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對歷史的客觀性挑戰也很大，這本書對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影響很大。談歷史客觀性時的重要模範是自然科學，但孔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說科學不是客觀的，而是很主觀的東西，科學家並不特別具有懷疑精神，科學家是很保守的一群人，而且科學理論不是如波普（Karl Popper, 1902–1994）所講的，先有理論，再不斷有事實來測試、甚至推翻理論。

孔恩反過來認為是理論把科學事實先掃進桶子內，然後把個別科學研究的成果塞進理論的典範（paradigm）裏面，等到有一天，產生很多非典範所能解釋的變異現象的時候，人們才開始慢慢思考這些典範所不能解釋的變異可能必須尋求另外的解釋，於是有人提出新理論，然後透過「科學社群」中的說服工作，慢慢形成另外的一個典範——所以是先有典範，再有科學家在裏面做拼圖填補的工作。而孔恩說典範是由科學家社群

所決定，受種種政治社會經濟原因的影響，使得人們會放棄原來的典範，尋找另一個典範。由此，科學也是由科學家社群決定，受種種社會政治經濟等影響，才能使科學家形成共識。既然典範先於科學家所講所做的實驗發現，如此科學的客觀性在哪裏？孔恩說，每一個典範都不能解釋所有大自然現象，新的典範解釋一部分，也丟棄了一部分，所以客觀在哪裏？

在我進入中研院以至到美國留學期間，德國社會歷史學派、美國社會科學影響下之史學和年鑑學派均很有力量，尤其是法國的年鑑學派。我在史語所的同事康樂（1950–2007）主持出版《新橋譯叢》時，便曾計劃大量翻譯年鑑學派的著作。大概是我到普林斯頓大學求學的第二年，便曾經花了一千多元美金搜集了二、三十本年鑑學派英譯的著作。我個人寫過柏克（Peter Burke）《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 1929–89》（*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89*）一書的書評，後來中文翻譯者放入書中作為導讀，其中談到年鑑學派形成過程與發展等大概。

柏克認為 1929 年至 1980 年代，年鑑學派經過三次變化，慢慢地從地窖升到閣樓。所謂地窖，是研究歷史底層、歷史結構、歷史整體長時段的變化，但到他們的第三代弟子卻又開始回過頭來研究人物——不過他們研究這些人物的方式已與傳統人物史的做法不同。柏克分成三階段來談年鑑學派，有失之簡化之嫌，但不無參考價值。

二十世紀後半，年鑑學派的影響很大，深入各國歷史研究，如美國、日本，甚至波蘭總理拉科夫斯基（Mieczysław Rakowski, 1926–2008）便是年鑑史家。年鑑學派的主要影響有：

(一) 使史學界研究的題目與材料無限擴大，這是年鑑學派對歷史最大的貢獻。過去被忽視的歷史角落，每天生活接觸的各式各樣問題都可作為研究題目。如年鑑學派研究生老病死，尤其是死亡，研究各種文明面對死亡的態度、面對死亡的方式等。所以百年之後回頭看二十世紀的史學，年鑑學派的許多主張或許會慢慢流失，但其解放史學題目及材料，賦予題目及材料新意義卻有重要影響，包括各式各樣的圖像、口供、日記、實物等材料。

(二) 重視整體歷史 (total history)，如年鑑學派第二代代表人物的布勞岱 (Fernand Braudel, 1902–1985) 認為應該寫「整體的歷史」，包括從地理、事件到個人，全部寫進去，所以布勞岱寫的《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只花七、八十頁寫最重要的那一場戰役，大部分內容包括地理、空間、物質文化等，最後才寫到事件；他說事件只是泡沫，人只是泡沫，重要的是結構。

(三) 布勞岱把歷史時間分成長時段 (longue durée)、中時段 (conjuncture)、事件 (event)。研究歷史不能只熟悉某一事件，應還有長時段、中時段的思考。他的這三種時間觀念影響相當大。但布勞岱並未非常有力地把三種時間有機地結合起來。布勞岱《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等書也因未把三時段串在一起，而受到一些批評。但他以這種時間觀念來看歷史，是過去少見的。不過，布勞岱的《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

本主義》一書開啟無數題目，許多博碩士論文及各種討論會的論文題目都可從其書中找到蛛絲馬跡，他告知我們一種看歷史的新眼光。

(四) 系列史 (serial history) 的看法：年鑑學派研究下層，講究整體 (collective) 的觀念，是受法國年鑑創始者布洛克 (Marc Bloch, 1886–1944) 和費夫賀 (Lucien Febvre, 1878–1956) 的老師輩涂爾幹 (Émile Durkheim, 1858–1917) 影響。涂爾幹重視整體觀念，年鑑學派認為許多材料無法從文獻中獲得。例如廣大人民何時放棄基督教信仰，是無法從文獻中看到變化過程的，所以要用各種零星材料，放在統計系列，從中得到歷史發展趨勢。例如沃維爾 (Michel Vovelle, 1933–2018) 研究法國去基督教化過程：到底法國是在法國大革命以後基督教信仰才逐漸流失，還是大革命是長期去基督教信仰之高峰？他的書認為應從一些日常人們所不注重的材料將之系列化，最後再看出其趨勢，因此統計許多遺囑中捐錢給教會的數目變化、教堂神像蠟燭的重量、建築空間佈置等傳統史家毫無興趣的問題，但這些研究方法確實可看出長時段演進趨勢。這是一般老百姓想法，老百姓沒有聲音，必須靠迂迴方式去了解他們心態的變化，建構系列，從而得出歷史發展，年鑑學派把這些研究方法運用至相當精巧的地步。

(五) 心態史：將來回顧二十世紀史學，心態史也必然是年鑑學派留下的重要遺產。過去研究重點基本上是思想史，重視思想家、思想運動與社會和歷史的關係；哲學史研究哲學家或重要哲學論題的歷史形成過程。可是年鑑學派提出心態史 (history of mentality) 研究，這與前述整體的觀念亦分不開，認

為我們不只要研究偉大的思想家，同時也要研究一個時代中下層百姓的心態，如他們對生老病死、對神、對權利、對國王的看法等集體心態。他們認為凱撒（Julius Caesar，前100年—前44年）時代一定有一些心態是從凱撒到他手下的士兵所共同擁有的，是集體的、整體的。

以心態史角度做研究而最具影響力的是年鑑學派第一代創始人費夫賀，他現在雖然不如布洛克那樣受人敬重，但其實他是年鑑學派形成最關鍵的人物，既有學問，也有政治手腕，善於掌握權力與組織。他有一本重要的書《十六世紀的無信仰問題：拉伯雷的宗教》（*The Problem of Unbelief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Religion of Rabelais*），談論十六世紀不信仰的問題。很多人認為法國通俗喜劇作家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生於1483—1494年間）是無神論者，可是費夫賀由心態史的角度來看，發現十六世紀根本不存在不信仰的問題。因為當時思想概念的工具中根本沒有「不信仰」這個概念，所以從當時心態環境看並沒有後人所爭辯的信仰或不信仰的問題，他認為這完全是後來人加上去的，而他的舉例都從一個時代集體心態史角度方法來論證這個論點。這是一本相當有意思的書，可以看到思想史研究不再只是研究個人，而是研究集體的心態，論證的方式相當有意思，這類作品在後來的年鑑學派中相當多。如杜比（Georges Duby，1919—1996）說法國把人分成三層，為甚麼大家甘於這麼被劃分？類似的則有如中國士農工商的區分法。這種心態一般思想文獻未提，但透過心態史重構，可了解一般百姓的想法，故心態史研究是注重廣大下層人民的。但心態史也有其弊病，例如用來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則完全不行，與年鑑學派

關係密切的一位史家曾用這種方式研究中國古代思想，結果看起來非常貧瘠，其最大問題是沒有辦法解釋變化——既然是結構的東西，持續時間相當長，但變化很少，也難以勾勒出來。總之，年鑑史學相當豐富，幾代的史學家非常活躍，中間也有許多曲折。

### 三、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

由於普林斯頓大學有史東（Lawrence Stone，1919—1999）等左派史學大家，在其影響下，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也是我當時感受到有重大影響的史學派別。馬克思主義史家可分為兩派：一派是教條的、官方的史學；一派是接受馬克思主義部分思想又加以修正的，著名的史學家多是先受其影響而後修正其思想，如希爾（Christopher Hill，1912—2003）、E·P·湯普森（E. P. Thompson，1924—1993）、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1917—2012）等人。

其中我最注意的是E·P·湯普森，其著作和論文開啟二十世紀下半葉許多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方式，影響很大。湯普森並非是十分專業的史家，他原先在勞工學校教授歷史，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卻又有修正馬克思主義的看法，最有名的書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我到美國唸書後發現這一本書竟然出現在許許多多課堂的書單內，這是非常令人驚訝的。這本書已經有中譯本。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者的文章透過他們所辦的《過去與現